

# 基于助推理论的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优化研究

付泽群

(滨州医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目前我国器官捐献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位，但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器官捐献与移植之间却存在巨大的供需不平衡问题。政府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立法尚不完善、社会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缺少实质利益推动等都是存在于我国器官捐献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为了加强我国公民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认同与社会参与感，政府可以基于助推理论来探索发展器官捐献事业的新思路，找到打破现时僵局的新渠道。

关键词：助推；政府；器官捐献移植体系

## 一、助推理论与器官捐献

### (一) 助推理论及其作用

“助推 (nudge)” 一词是由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H·塞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在所著的《助推》中正式提出的，其原意为“用肘轻推以引起某人的注意”，以提醒你可能会犯的错误，助你回归正途。在本书中，作者认为人不是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社会人会在做抉择时被环境他人、直觉思维、无知偏见等各种因素左右而毫无察觉，从而导致决策偏差。而有了助推理论中的“选择设计者”，人们就能够在他们所创造的一种决策环境中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和放弃不喜欢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这既不妨碍人自由地做出选择，也不会给选择者增加负担，其本意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维护人们的利益，让他们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正如书中提到的“自由意志的家长制”，自由意志是指保留人们自由独立决策的权利，而家长制则是为了适当影响人们的决策过程，好让人们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两者融合会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这也就是说，不对处于决策环境中的人施加强制措施，而是以一种预言的方式去影响人的选择或改变他们的动机行为，这就是“助推”<sup>[1]</sup>。

### (二) 政府助推与器官捐献的关系

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是国家管理的执行机关，具有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对建设完善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事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能通过立法、公益宣传等办法促使社会意识的形成，将器官捐献引入大众视野并提高其社会关注度，以行之有效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而提高社会人群的器官捐献意愿以及捐献率。助推理论使用温和的方法来引导人们做出更有利于自己和社会发展的选择。这是泰勒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以此研究我国器官移植所面临的巨大缺口问题。政府可以通过这一理论对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进行优化，同时运用助推理论中的思想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引导约束，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帮助人们主动地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增强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感。

### (三) 政府引入助推理论的实践

英国是最早将助推理论引入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国家，首相卡梅伦政府所成立的行为动见研究小组在包括器官捐献在内的多个领域开展了几十项试验，根据研究结果颁发了各种政策并实施相关措施，在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sup>[2]</sup>。在国民器官捐献方面，欧洲许多国家都实行“推定同意”的方法，它改变了默认规则，不同于明确同意，但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利，即那些不同意默认选项的人在退出时必须注册登记。<sup>[3]</sup>这就相当于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

以最小成本实现人们的自主意愿。而这一政策也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奥地利和德国的器官捐献同意率作比较，奥地利采用推定同意制度，有 99% 国民同意捐献，而德国采用鼓励参与系统，结果仅有 12% 人口同意捐献。这就是默认规则的影响力<sup>[4]</sup>。

## 二、当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建设和发展现状

### (一) 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基本状况

近几年，我国器官移植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国内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与此同时，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起步较晚，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发展尚未完善以及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民众在器官捐献的认知认同与参与感上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sup>[45]</sup>。据统计，在 2018 年，我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为 4.53，而在西班牙该捐献率却高达 48.2。目前，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登记的有效志愿人数为 3122105 人<sup>①</sup>，这与我国超 14 亿的人口规模严重不匹配。而我国每年大约有 30 万潜在器官移植患者，却仅有 1 万例患者能成功进行器官移植手术。<sup>[5]</sup>可见，我国可用移植器官的数量严重掣肘了器官移植手术的进展。

据研究者调查：“在浙江省居民调查中，有 47.9% 的受访者愿意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31.7% 的受访者拒绝签署，还有 18.7% 的受访者表示犹豫。然而无论是否同意捐献，在签署捐献志愿书时，69.9% 的受访者表示会顾及家人的态度。”<sup>[6]</sup>换言之，家人态度在决定人们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因素中可能起着主要作用。所以，我国器官捐献与利用事业存在亟需突破的现实困境。

### (二) 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发展缓慢的原因

#### 1. 传统观念对器官捐献的冲击

我国自古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的说法，而这种孝文化恰与器官捐献的行为相冲突，再加上讳言死亡的传统文化氛围，更是加重了遗体捐献的难度。

另外，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强调家庭对于个人发展的影响，即便有人存在捐献自己器官的意愿，但作为家庭中的一分子，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近亲属对自己行为的干预，而绝大多数人并非器官捐献的拥护者，这也就间接地影响到个人最终的捐献意愿。

#### 2. 器官捐献的利益失衡

对于器官捐献这个行为本身来说，它是无偿和公益性质的，驱动它的只能是崇高的道德感。但是器官的社会需求量却是庞大且现实的，如果完全依赖于社会公众的道德感来实现器官供给，显而易见这是完全行不通的。缺乏实际利益推动的行为本就稀缺，更何况是捐献出自己现实赖以生存的身体器官。另外，即使一个人品德高尚，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捐献自己的器官，那他也要经受伦理的考

验,承担社会舆论的风险,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所以,捐献人在其捐献行为后所得起码要大于等于捐献所带来的时间精力消耗和舆论风险所带来的成本之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器官捐献的利益得失问题。

### 3.制度设计与登记程序不够完善

要想真正实现器官捐献困境的突破,少不了国家立法层面的支持。然而,即使国家自2007年已相继出台了多部人体器官捐献相关立法,但是如何实现捐赠,尤其是替代同意捐赠立法仍不明晰<sup>[7]</sup>,在伦理执行方面还有较大争议。而在人体捐献立法中,对于何人合理合法拥有人体器官的处分权,在社会上仍有不同观点的讨论。另外,由于登记程序繁琐,缺乏良好的信任环境使社会大众对其信度不高等原因,也阻碍了人们对器官捐献的热情。

### 三、助推理论下的具体措施

#### (一) 发挥榜样力量

无论在哪个时代,榜样的力量都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钦佩的偶像、英雄,人们出于崇拜情结便会不由自主地向他们学习。这时,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公众人物对大众的榜样作用,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引导大家对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关注与正确认识。与此同时,政府要恰当引导媒体平台,借助媒体力量扩大公益宣传的正能量,通过微视频、微博、公众号等平台发挥好明星效应的道德感染力,让更多人关注到器官捐献与移植建设,明白器官捐献的社会意义。

#### (二) 给予合适的精神物质奖励

塞勒在1980年提出一个“禀赋效应”,即处于决策中的人对“避害”的思虑总是大于“趋利”。毫无疑问,在这种概念下,器官与遗体捐献的无偿与公益属性使捐献者的“固有资产”失去的结果必然会趋使民众“避害”,更何况即使捐献也没有何利所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出一些奖励政策,一种非货币形式的、精神上和行为上的鼓励和补助。政府及相关组织加快落实和规范捐献者纪念馆的建立;给予捐献者本人及其近亲属一些医疗方面的优待,如在一定范围内加大医保报销比例,优先得到医疗贫困补助等;由相关部门为捐献者家庭提供遗体火化及殡葬服务等,提高社会认同感,落实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sup>[8]</sup>

#### (三) 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

《助推》中提到过“一个错误假设”——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或者做出至少比别人好的选择。这毋庸置疑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更易在一个信息全面且反馈及时的环境中做出较好的选择,而在那些缺乏了解与经验的地

方很难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sup>[1]</sup>。而在器官捐献这个大家相对陌生的领域,信息公开就显得相当重要,至少了解足够多的信息才能做出更为理智的选择。当然,这与器官捐献制度中的双盲原则并不冲突,更不会向社会披露捐献者与受捐者的信息,而是要政府医院等相关机构在符合伦理的情况下,联合给出一套公正透明的捐献流程、定期公开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捐献记录与结果,详细且通俗易懂地展现器官捐献领域的实时进展,消除大众对器官来源与去路的怀疑,降低人们对器官分配的公正担忧。

#### (四) 设立器官捐献通识教育

青少年人群是国家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的很多行为代表着社会思想的主流,所以强化针对主流群体的通识教育显得极为重要。在此,笔者建议政府可以联合医学机构、出版社制作适合这类群体学习的教育资源,以器官捐献的发展史、基本知识、脑死亡、捐献途径等多个角度进行集中学习,在各级学校内以讲座、培训会等方式集中宣传,借此让他们对器官捐献产生清晰的认知,消除误解提高信度,并由此以家庭为单位逐步扩大宣传效应,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基本“脱盲”。

注释:①数据源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reseccod.cn/>,访问时间2021年3月22日。

#### 参考文献:

- [1]理查德·泰勒,卡斯·桑斯坦.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M].中信出版社,2015.
- [2]Nudge nudge, think think: The us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in public policy shows promise [J]. Economist. Mar. 24.2012
- [3]张瑞涛,吴江峰,骆社丹,等.国外器官捐献概况及对我国器官捐献的启示[J].教育教学论坛,2014,(43)
- [4]马爱荣,胡晓栋,郁松.中国遗体捐献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J].解剖学杂志,2020,43(02)
- [5]杨颖,黄海,邱鸿钟.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医院,2014,18(3):18-19.
- [6]刘维,戴振峰,黄君婷.家庭视角下浙江省居民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医学与社会,2020,33(06)
- [7]蒋继贫,王心强,万聪.健康中国语境下遗体捐赠与利用的替代同意权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8(01)
- [8]刘煜晴,姜鑫.西班牙模式对我国器官移植供体保护的启示[J].医学与法学,2017,9(04)

作者简介:付泽群,2000年11月生,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潍坊市,大学本科学历,预防医学专业